

青年黑格尔派的兴盛及其政治批判

王 兆 星

青年黑格尔派以1835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问世而出现,随着1844年底“自由人”的《文学总汇报》被查封而终结,前后只不过近十年的时间,可谓是德国哲学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然而,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它也有着自己的盛衰荣枯的历史。1840年至1842年间,可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封建君主国家进行了全面批判,即在继续宗教批判的同时转向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由间接批判转向直接批判,掀起了一个理论批判的高潮。

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观点,对推动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和促进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以至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演进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对正确认识和理解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演进和确立有重要意义。

青年黑格尔派的兴盛

1840年6月,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和法德战争危机的形势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位。早在王储时代,他就热中于亚当·弥勒和哈勒的世袭国家理论,仇视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想,梦想恢复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然而,他为人奸诈,在登位之初,作出一些伪善的许诺和宽容的措施,以自由主义的伪装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如:重新恢复了在查究“煽动者”时期被革职的冯·博伊恩将军和阿伦特教授的职位;把在1837年因反对汉诺威国王取消宪法而被驱逐出境的哥丁根大学七教授之一的著名童话作家格林兄弟聘请到柏林加以任用;颁发旨谕,放宽书报检查制度;并许诺颁布宪法和召集邦国民议会等。这一切一时迷惑了自由派。即使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除马克思外,也很少有人能看清国王的真实意图。上述这些措施,特别是书报检查的一时放松,使青年黑格尔派在1840至1842年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841年秋,在布·鲍威尔和马克思先后离开柏林,“博士俱乐部”消失之后,成立了柏林“自由人”团体,并创办了机关刊物《艺文》杂志;1841年7月,在《哈雷年鉴》停刊之后,卢格创办并主编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激进更坦率的《德国年鉴》;1842年1月,标志着莱茵资产阶级和青年黑格尔派联盟的、由卢滕堡和马克思先后任主编的《莱茵报》的出版,等等。同时,青年黑格尔派通过提供必需的材料掌握了德国所有自由派刊物,使其成为自己的喉舌,而且在德国每个重要城市都有着自己的追随者,因而使它在每个问题上都能很快控制社会舆论。如恩格斯所说:“书报检查制度的一时放松大大增强了这个对于大部分德国人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运动的力量。”“这个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大大出人意料之外,不论是政府或是社会人士一时都被吓得目瞪口呆。”^①这一切表明,1840至1842年间是青年黑格尔派发展的全盛时期,它已成为反对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可是,当各邦政府刚一清

醒过来，便立即采取了凶狠的镇压措施。1841年，威廉四世凶相毕露首先镇压了东普鲁士首府科尼斯堡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把《一个东普鲁士居民对四个问题的回答》的作者科尼斯堡医生约翰·雅可比以叛国罪和侮辱陛下罪判处要塞监禁；严厉申斥了支持雅可比的东普鲁士省长冯·雪恩，并把他革了职。接着，各种小册子、报纸、期刊和学术著作陆续遭到查禁，青年黑格尔派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者。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活动也就愈益向纵深发展，随着阶级斗争形势变化，开始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种批判，并行不悖，平行发展，互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理论批判的高潮。

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

1840年，随着德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的斗争，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由宗教领域直接进到政治领域，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这种批判最初虽然以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但却充满了柔情和敬意，只是到了1842年才日趋激进和尖锐。政治领域中的根本问题是国家问题，因而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就集中地表现为对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早在1839年10月，阿·卢格就开始了政治批判，他和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新教和浪漫主义，论对我们的时代及其矛盾的理解》一文，可谓是声讨反动派的政治宣言，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开始。然而，从整体上看，青年黑格尔派这时仍然停留在宗教批判的阶段。

1840年至1841年6月，在卢格的政治批判的影响下，同时由于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危机和威廉四世反动倾向的加强，“博士俱乐部”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相继纷纷转向政治批判

1840年，“博士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科本第一个开始了政治批判。他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的小册子。他高度赞扬弗里德里希二世是理性的、开明的国王，并认为他的启蒙精神、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精神、由国家存在体现出来的严格的公道精神，是永垂不朽的。这实际上是以历史隐喻的手法抨击了普鲁士国家扼杀自由精神的反动政治倾向。

布·鲍威尔作为“博士俱乐部”的思想领袖虽然在1840年出版的《普鲁士国家的天主教和科学》小册子中谈到了普鲁士国家，但在这里除了充满对普鲁士国家的尊敬和希望之外，没有任何的批判。他认为，普鲁士具有理想国家的属性和理想变革的趋向。他指出，我们对历史的未来满怀信心，并以同样的信心来看待我们的君主，我们期望王权发出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变革的信号。由此，严格说来，他只是在1841年才开始准备进行政治批判，如他在3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现在我正准备写一篇更长的文章，来反对政府的倾向。”^②不久，6月7日，他就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第一篇政治批判的论文：《基督教国家和现代生活》。在文章中，他虽然还未摆脱黑格尔的国家观点，但已清楚地表明，普鲁士已不是他所想象的具有理想属性的国家，而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它在思想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并未实施自由的原则，而是听任基督教护教论者的摆布。他认为，基督教国家遵照宗教的指令镇压一切自由和自治思想的表现，排挤精神，哄骗和窒息人类一切爱好和志趣，负有造成犯罪之责。而作为自我意识创造的国家，即理性国家，是不受教会监护的、获得本身无限性的国家。因此，他认为，哲学必须同基督教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这一斗争象早期基督教同古代世界斗争一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迄至1842年止，布·鲍威尔先后在《哈雷年鉴》、《德国年鉴》和《莱

茵报》上发表了20多篇有关政治批判的文章。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政治观点愈来愈激进。在这些文章中，他从法国大革命原则即使教会和极权主义的统治崩溃出发，阐明了自己关于革命和共和主义的思想。如果说，在此之前，他曾一度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改革实现理性国家，那末到1842年，他则抛弃了这个幻想，明确提出了要革命，不要改革的口号。他在给卢格的信和一些文章中，多次强调革命原则的意义。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切历史运动至高无上的法则，革命是反对世界上反动统治和天上邪恶力量的战争，是反对一切暴政的形式。因此，他把源于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强有力的激烈变革作为自己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为了避免书报检查，他在1842年4月发表在《莱茵报》上有关法国问题的文章中，在论述法国问题时，还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他针对法国路易·菲力蒲的立宪政体指出，法兰西民族对立宪试验已表现出厌倦，并准备去创造立宪原则的真正成果——废除立宪制度的对立面，创建共和国。这表明他已摒弃了原先的立宪主义的观点，确立了民主共和的立场。他还特别赞赏美国的联邦共和制，认为它是希腊城邦国家形式和法国吉伦特派共和制的移植和发展，是民主共和的理想形式。因此，他指出，谁要是想到欧洲和德国的未来，谁就不能忽视美国。

“博士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如马克思和梅因，以及后来加入柏林“自由人”小组的恩格斯也都于1841年先后开始了政治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斯，也于同时参加了政治批判。他在1841年出版的《欧洲的头三头政治》一书中，主张普鲁士同法国和英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在实力上超过反动大国即俄国和奥地利的进步国家联盟。这实际上表明了他的进步政治立场。尤应指出的是，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不同：他没有使政治脱离社会斗争，而是把政治批判发展为社会批判，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由政治批判转向社会批判的先导。费尔巴哈由于长期隐居使他避开了普鲁士现实中反动方面的直接影响，并与德国发展中的进步的、革命的力量相隔绝，因而没有发表政治批判方面的论著。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是极端冷漠的。他在1848—1849年所作的《宗教本质讲演录》中回忆说：“我不仅同那个时代的统治的政治制度经常处于对立的地位，而且同那个时代的统治的思想体系，即哲学思潮和宗教思潮，也是处于对立的地位。”^③这里清楚地表明他对普鲁士政治制度的对立态度。因此，不应把费尔巴哈的“隐居”看作为对政治的回避和冷淡，而应把它看成是对普鲁士反动政治的抗议的一种形式。

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创导者—阿·卢格

随着形势的发展，至1842年，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已发展成为颇具声势的批判高潮。应当指出，在所有参加政治批判的人士中间，阿·卢格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创导者，而且代表了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主流和变迁。

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创导者，正是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青年黑格尔派才逐渐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卢格的政治批判在思想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批判，在国家问题上，他由信奉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发展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由君主立宪主义走向民主共和主义。

如前所述，1839年10月12日，卢格与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新教和浪漫主义，论对我们的时代及其矛盾的理解》一文。这是他首次讨伐反动派的政治檄文。从这时

起，到1841年初，是卢格政治批判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仍然遵循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如黑格尔一样，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普鲁士国家只是在过去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才是理性的国家，而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则背叛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在他看来，普鲁士国家只要忠于自己的过去，重新发扬曾首次推动历史合理发展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精神就可以完成它的最高使命。正是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他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批判。在《新教和浪漫主义，论对我们的时代及其矛盾的理解》一文中，他认为，普鲁士作为一个理性国家，其使命就是捍卫自由的原则。然而，普鲁士之所以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在于它在当时的为王储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庇护的、以亚·弥勒和哈勒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影响下变得反动。因此，卢格指出，必须号召普鲁士立即同以浪漫主义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一刀两断，捍卫自由的原则，发扬宗教改革精神，以便推动立宪运动前进。

随着普鲁士国家的日益反动，卢格的批判也就愈益尖锐了。为了能自由行动，他于1839年离开了哈雷大学，并于同年11月在《卡尔·施特列克福斯和普鲁士主义》一文中首次公开反对普鲁士政府。他谴责普鲁士国家是“天主教的”。他指出，普鲁士就其生存本身或深远趋向来说，都是天主教的，这是自由德意志的危险所在。所谓“天主教的”，是当时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流行的一个神秘化的术语，其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缺乏公开性，人民本身不能参与国事。因此，他要求普鲁士实行“新教的”自由发展的原则，允许自由讨论问题。他认为，只有浸透了我们整个国家并在宪法生活中获得其世俗现实性的基本新教，只有在这样恢复了自由和真正宗教改革式的发展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成为在欧洲举足轻重的、自由德意志的首脑和中心。

1840年，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反动倾向的加强和普法战争危机的逼近，卢格的批判愈益具有更加公开反对的立场和明确的政治性质。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威廉三世的官僚制度已不甚同情，那末，现在对威廉四世反动倾向则是公然地憎恨。如果说，在此之前，他把自由倾向和反动倾向之间的冲突理解为新教和天主教的对立，因而使批判带有理论和教义的色彩，那末，现在，则是把它归结为立宪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批判具有更为明确的政治性质。1840年4月，在普法战争危机逼近的时刻，卢格在《门采尔。1840年的欧洲》一文中，谴责了普鲁士的反法倾向，明确地指出它只有走立宪主义的道路，才能使自己作为理性国家的发展日趋完善，才能有欧洲自由主义的前途。他认为，处在反动大国俄、奥同自由主义大国英、法之间的普鲁士的动向，决定着欧洲的前途。如果在普鲁士实现立宪主义，它势必要与自由大国英、法联合，从而推动欧洲自由主义的发展。反之，如果普鲁士与反动大国俄、奥联合，那末，它就将使专制主义获得胜利，使欧洲回到反动的“神圣同盟”时代。为此，他指出，普鲁士只有在实现了新教以及立宪主义的一切成果时，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比较完善的理性国家，并推动欧洲走向自由主义。同年11月，他更是把立宪和反立宪作为区别自由主义反对派和专制主义反动派的主要标志。1841年初，卢格以更加尖锐的词句表示了对没有政治自由的普鲁士国家的愤怒和抗议。1月，他在《哈雷年鉴》合订本的《序言》中指出，仅有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是不够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政治自由就绝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学术没有政治自由是胡闹，无论是拒绝自由国家还是要求自由国家的人都承认精神史总的来说和政治史是同一运动，是自由的产物。”^④2月，在《莱比锡报和社会舆论》一文中，他愤怒地抗议普鲁士专制制度，指出，它是一个人民不参与治理的制度，自由的设施在这里成了反常现象，因而是对国家精神本身的最坚决的否定，必须对它提出严重抗议。

总之，在这一阶段，卢格的政治批判内容，就是以新教反对天主教，以自由主义反对浪漫主义，以立宪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并且把这一批判任务的实现，寄希望于普鲁士国家。因此，这就决定了他对普鲁士国家的态度，这就是：既有批判，又有幻想，既有指责，又有期待，充分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1841年6月，政府对《哈雷年鉴》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命令卢格把《哈雷年鉴》移至普鲁士出版，以便对它进行检查。为了避免检查和保全杂志，卢格于7月2日将《哈雷年鉴》改名为《德意志年鉴》继续出版。《德意志年鉴》继续担负着《哈雷年鉴》的使命，成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中心。它的出版，标志着卢格的政治批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恩格斯说：“党刊《德国年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激进更坦率了。”^⑤这一阶段，历时较短，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一阶段，尽管卢格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的国家观点上，并继续局限于现存制度下进行资产阶级的立宪自由的政治改革。但是，与前一阶段比较，卢格的政治批判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由于普鲁士国家的日趋反动，卢格已逐渐抛弃了对它的幻想。如果说，过去他把争取自由的事业寄希望于普鲁士国家，从而表示了对它尊敬；那末，现在他认为新哲学才是形成中的历史的自由力量，只有通过哲学反对基督教国家的斗争，才能实现政治改革的任务，因而对普鲁士国家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如他说：“反对三股异己力量——完成了的哲学体系，假定的教义学和经验的现实（这三者是指现存的政治状况——编者注）——的解放战争，使最新哲学对外界采取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崭新立场。哲学真正是什么，它是正在形成的历史的自由力量。”^⑥其次，卢格已放弃了任何妥协。他在《新教专制主义及其发展》一文中，对怕走极端的庸人们的畏首畏尾、踌躇不定的态度进行了有力抨击。他认为，这种动摇现象，实质上是畏惧革命和害怕自由的表现。因此，他严肃地指出，这种情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必须使新哲学精神和革命意志深入到生活中去。

1842年，由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特别是政府迫害布·鲍威尔的事件，反动势力日益猖獗，使卢格变得更加的激进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批判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卢格不但不再遵循黑格尔的国家原则，而且开始抛弃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以确当的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已不再局限于现存制度下进行立宪自由的政治改革，而是强烈要求推翻普鲁士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共和制，开始从自由主义走向民主主义。

1842年初，卢格认为，批判所进行的全面的理论革命，其目的就是否定基督教，确立无神论，否定专制制度，实现人民的主权。他在给友人（普鲁茨、罗生克兰茨）的信中强调指出，革命就是要树立人的精神自律的原则。什么地方树立了原则，哪个地方，使人的精神依赖于彼岸的、神的事物的基督教就会垮台，而那使国家和臣民服从于更高的意志并且不承认人民主权的专制制度也要垮台，这就是革命。而要实现人民的主权，国家制度就必须是民主共和制。因为真正的国家制度就是共和制，而共和制如果不是民主制，那末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是真正的共和制。

随着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的深入和加强，反动势力更是气焰嚣张。3月初，《德意志年鉴》已面临被查封的危险。面对反动派的猖獗，卢格临危不惧，继续大胆地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1842年8月，卢格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和现代政治》一文，开始了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他认为，黑格尔法哲学的缺点，就是脱离活生生的历史，片面地空

谈理论，并使之绝对化。黑格尔把历史事实归结为逻辑范畴，归结为概念。因而他不是历史地具体地看待国家和国家制度，而是错误地把世袭王权、长子继承权、两院制等等说成是逻辑的必然，把某种国家制度看成是永恒的形式。卢格批判地指出，不能把国家看成是绝对的并把它和活生生的历史分割开来，因为任何国家概念和哲学本身一般说来都是历史的产物；此外，之所以不能把某种国家制度，即具体国家看成永恒的形式，还因为具体的国家不外就是精神存在的形式，精神就是历史地体现在这种形式里面的。由此，他认为，在德国，批判应当更接近生活，应当把法国的实干精神同德国的理论精神结合起来，以便在德国出现一个真正的而不仅仅是理论的批判，从而达到通过实现民主共和国以保障政治自由的目的。

1843年1月，鉴于德国自由派的软弱无力，柏林“自由人”小组日益远离政治运动，把批判变为目的本身，卢格在最后一期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一文，公开地对自由主义（包括自己的自由主义的过去）进行了批判。他深刻地指出，在德国，“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党派”，而且“当政治的德国不存在”，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党”。它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贫乏理论”，而且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因为它“是如此含混不清和无边无际，以致容纳得下一切可能的东西，一切神和一切国家……”，“因为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它想要什么”，而它想要的东西它本身又不愿意去做，“只想让别人去做”。由此，“自由主义不是自由，而只是对外国自由的同情，至多不过是对偶然是自己的、应通过某种意外的机会从外部带给这个民族的自由的向往。”^⑦于是，他认为，为使德意志世界免于毁灭，并使它的未来得到保障，德国社会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在一切领域中都要把自由的人当成原则，把人民当成目的，一句话，自由主义要溶化在民主主义中。”^⑧从此，在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部分人中间，“民主主义”一词，就代替了过去含糊不清的“激进主义”这一术语。

卢格这一阶段的政治批判，内容更加深入，概念更加明确，倾向更加激进，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除马克思恩格斯而外，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少数几个有见识的成员之一。然而，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唯心主义观念，致使他虽然认识到哲学必须同实际生活、同人民相结合，但却不能站在彻底的人民的立场上，进行具体的社会政治斗争；他虽然要求历史地看待国家，但却认为国家是精神存在的历史形式，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虽然信奉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在他那里却是虚幻的。因而，这就决定了卢格的政治批判未能超越以批判现存事物为形式的理论批判；决定了他从此长期停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于是，当问题涉及到社会批判，涉及到共产主义，他就心力不济、畏缩不前了。

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尽管在实际的政治成果上收效甚微，但其思想理论的成就和影响是不应忽视和抹杀的。它不仅在思想上准备了德国的三月革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激励和呼唤着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引进政治斗争的激流，为他们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养分，从而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因此，离开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批判，孤立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政治思想，就不能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演进和确立。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0页。

②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49页脚注5。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05页。

④⑥⑦⑧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版，第149、149—150、152、1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9页。